

一根能思想的芦苇

人总是活在两个世界之中，一个是现实世界，一个是精神世界。至于哪个世界才是自己存在的真正目的，那就因人而定了。对傅雷来说，精神的独立或许才是他真正的生命之所在，可以说，傅雷一生都在寻求与实践这种精神的自我诉求。这种精神的诉求并非简单的浪漫主义或理想主义玄想，而是对个体的自我存在价值的探求。

在1937年出版的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第一卷的“译者献辞”中，傅雷这样写道：

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不是一部小说，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——应当说，不止是一部小说，而是人类一部伟大的史诗。它所描绘歌咏的不是人类在物质方面而是在精神方面所经历的艰难，不是征服内界而是征服外界的战迹，它是千百生灵的一面镜子，是古今中外英雄圣哲的一部历险记，是贝多芬式的一阙大交响乐。

建国后的1952年，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重译本出版时，傅雷在作品介绍中有这样一段话：

本书一方面描写一个强毅的性格怎样克服内心的敌人，反抗虚伪的社会，排斥病态的艺术；它不但成为主人翁克利斯朵夫的历险记，并且是一部音乐的史诗。另一方面，它反映二十世纪初期那一代的斗争与热情，融合德、法、意三大民族精神的理想，用罗曼·罗兰自己的话说，仿佛是一个时代的“精神的遗嘱”

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是傅雷最重要的译作之一，他前后共翻译出版了两个译本，并多次写文章对这部作品进行评介。从上面两段引文中我们可以看到，傅雷始终是从“精神”的角度理解这部史诗性作品的，并与罗曼·罗兰和克利斯朵夫产生了巨大的共鸣。如果再仔细了解傅雷的人生经历以及他的译著和论著，我们就会发现，对一种完美精神世界的追求，既是傅雷一生的自我约束，又是我们解读傅雷的一把钥匙。

傅雷是一个完美主义者，对自己、对朋友、对儿子、对社会，几乎都在苛求着完美，有时甚至近乎极端，就像他对儿子傅聪的教育那样，使儿子经常感到难以忍受，也使朋友们感到难以理解。但这是傅

雷做人的信念。也正是在这种信念的支配下，才造就了被人敬仰的傅雷，造就了“一颗纯洁、正直、真诚、高尚的灵魂”（楼适夷语）。

傅雷并非超凡脱俗的圣人，也并非勇往直前的斗士，他只不过是按照自己做人的原则行事罢了。他有过盲从，有过惊慌失措，直至晚年几乎完全退回书斋之中，不问时世，但是时世却并没有放过他。

建国以后，同其他几乎所有知识分子一样，傅雷也为时代的改天换地而欢呼，为人民的革命热情所感染，同样急切地盼望能够彻底抛弃旧我脱胎换骨成为新人。他在努力工作，用他的笔、他的真诚、他的热情，为时代与人民服务。当暴风雨来临时，他也同样害怕、恐惧、愤怒、狂躁、不知所措，但是，同其他很多人不同的是，他又绝不会因为害怕与恐惧放弃自己的思考。帕斯卡说：人只不过是一根芦苇，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；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芦苇。听上去说的就是傅雷这样的人：虽然脆弱，却绝不放弃自己的原则，甚至不惜以自己的毁灭来维护它……



第一章 在初春里徘徊

我称为英雄的，并非以思想或强力称雄的人，而只是靠心灵而伟大的人。好似他们之中最伟大的一个，就是我们要叙述他的生涯的人所说的：“除了仁慈以外，我不承认还有什么优越底标记。”没有伟大的品格，就没有伟大的人，甚至也没有伟大的艺术家，伟大的行动者。

——罗曼·罗兰《贝多芬传》

1949年的傅雷已经是国内著名学者、艺术评论家、翻译家，而在中国历史发生剧变的时刻，傅雷也面临着人生的重大选择。

随着解放战争的打响，人民解放军开始以摧枯拉朽之势从东北打到了中原。此时，几乎所有人都知道，国民党的败亡已经无可避免了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很多人很自然地开始考虑自己的去留问题。

尤其是那些著名的知识分子，这个时候更要考虑如何把握自己的命运。走，有两条路，或者海外，或者台湾。没有几个人想去台湾，蒋介石

连大陆都守不住，区区一个台湾海峡又能挡住什么呢？也没有多少人愿意替国民党尽忠，因为人们已经对这个政权彻底失望了。

去海外又能怎样呢？没有任何根基的人即使去了，靠什么生存就成为不得不考虑的问题。不错，胡适是坐飞机跑到美国了。但胡适在美国生活多年，而且人家已经在美国获得了 30 多个荣誉博士学位，在美国学术界有很高的知名度。自己到国外干什么呢？再说了，当时中国教授工资很高，许多海外留学人员回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内的收入，他们知道，到国外能够享受现在的生活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。

但是留下呢？这也不是容易决定的事情。国统区的知识分子对共产党并不了解，尤其是从日常新闻报道中得到的常常是负面消息。不过从民间传来的各种消息都显示出，这是一个真正的民主政党。

熟读中国历史的知识分子都有这样的想法：一个新朝代的建立，总会伴随着一个“开国盛世”的出现，这往往是百年不遇的事情。

处于这样一个剧变中的傅雷，也面临着这样的选择：是走还是留？这是一个问题，确实是一个哈姆雷特式的问题……

傅雷一生中，这样艰难的选择并不多见，此前可能只有一次。那是在法国。当时的傅雷正是一个风华正茂的年轻人，可能同其他人一样，人生第一次重大选择总是同爱情有关：傅雷狂热地爱上了一个法国姑娘——玛德琳。

1927 年，只有 19 岁的傅雷来到了巴黎。一开始是学习语言，半年后，就以优异成绩考入国立巴黎大学文科，学习艺术理论。在塞纳河的清风吹拂下，在卢浮宫中无数大师巨作的冲击之下，在香榭丽舍大街的艳丽的夕阳中，傅雷的艺术天性被极大地激发起来。与此同时，在法国式浪漫的熏陶之下，那种在古老的中国可能会被压抑的天性，也在傅雷身上爆发了出来：性格内向的傅雷进入了狂热的爱河之中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对于这段感情，傅雷的老朋友曾经有过这样的回忆：

开始是法国女郎玛德琳比较主动。这位女郎会弹会唱，喜欢探讨艺术，但理解并不深刻。傅雷的人品、学问，很使玛德琳倾倒；年青的傅雷，穿着当时艺术家流行的服装，打着花式领结，留着长长的头发，昂首天外的神态，颇有中西合璧的风度，更使玛德琳这位西方女郎所迷醉。玛德琳一头金发，皮肤白皙，眼珠有如地中海的海水一样碧蓝，与傅雷谈起话来，就像塞纳河的流水声喁喁不绝。两人频繁接触当中，感情逐渐炽热起来。尽管傅雷早就爱上了朱梅馥，但现在面对有着共同爱好的玛德琳，他觉得，这位迷人的法国女郎，要比表妹可爱多了。 ①

这里的表妹指的就是傅雷的未婚妻朱梅馥。同那些 20 来岁初入爱河的年轻人一样，在傅雷心中，爱情也是一个神圣的字眼。虽然在此之前，由守寡的母亲做主，要他和远房表妹朱梅馥结为秦晋之好。这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包办婚姻，但对于陷入爱河的傅雷，或许只有在玛德琳那里才能找到真正的爱情。20 岁的傅雷，一贯孝顺的傅雷，面对这样的抉择，又该如何向母亲解释？这一切，都让傅雷难以决定。

在无数次失眠与痛苦的自我斗争之后，爱情的力量还是战胜了一切；也可能一开始傅雷就知道要为爱情而牺牲一切，只不过难以决定的是如何把这件事情告诉母亲。最终，傅雷决定把这件事情告诉母亲。在信中，傅雷说，自己已经是成年人，婚姻应该由自己来做主，希望母亲解除和朱梅馥的婚约，也希望表妹能够有自己的追求与选择。信

①转引自金梅《傅雷》,第 40－41页，中国华侨出版社，1999年版

写完了，傅雷却没有勇气寄出去，于是采取了一个掩耳盗铃的方法，让好友刘海粟帮他寄出。但不久又要了回来，还添了一句：儿在异国已经有了意中人。不过，过了一会儿又涂掉了这句话。由此也可以看出，当时的傅雷，内心是多么的矛盾与混乱。

这可能是傅雷成人以后独立做出的第一个重大决定。决定做出后，傅雷感到了这些天来少有的轻松与解脱，兴冲冲地去找玛德琳，要把自己的决定在第一时间告诉她。

这时的傅雷很可能没有想到，他很快就会为此感到后悔。爱情的魔力使他忘记了一切，可是，当他冲到玛德琳那里的时候，一幕意外的场景让他惊呆了：玛德琳正在同另一个男子热烈地拥抱着。失去理智的傅雷抄起一把椅子就砸了过去，幸亏没有砸中。在玛德琳的解释与亲吻之下，傅雷慢慢平静了下来，还说服自己这不过是不同国家、不同民族的文化差异罢了，确实没什么了不起。两人于是和好如初。

此后，玛德琳虽然依然爱着傅雷，但法国姑娘的天性使她无法断绝与其他男子的来往，而这是傅雷最难以忍受的。虽然对法国文化中特有的浪漫品质已经有了深深的了解，但让傅雷接受心上人与自己交往的同时还同其他男子藕断丝连，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。尤其是当傅雷向玛德琳求婚的时候，玛德琳却觉得虽然两人相爱，却没有必要用一纸法律文书约束自己的自由。东西方文化在这里激烈地冲撞了起来。

作为一个中国人，相爱、结婚、终老一生是人生的必然过程。傅雷自然也不例外。但对于法国姑娘玛德琳来讲，相爱并非一定意味着结婚。傅雷和他的情人都无法说服对方。在不断争吵又不断和好的过程中，傅雷都快要崩溃了。他甚至想到了拿枪自杀。

最终，在年长自己 10 岁的刘海粟的劝说之下，傅雷平静了。他开始冷静地思考这段感情。文化上的巨大差异，使傅雷真正认识到了婚姻的困难，于是，他同玛德琳冷静地分手了。虽然玛德琳对此感到难

以理解，但是，她尊重傅雷的选择。

感情的纠葛结束以后，傅雷开始为自己写给母亲的那封信感到后悔了，他不知道远在家乡的母亲看到信后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，也不知道自己的表妹知道这件事后，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，更不知道自己回国以后该如何面对她们。他只知道，自己的决定对她们肯定是一个沉重的打击。傅雷由此陷入了深深的悔恨之中。

而这时，刘海粟夫妇却告诉傅雷一个惊人的消息：那封信他们并没有寄出去。事情是这样的：看到傅雷失去理智的样子，生活经验要比傅雷丰富得多的刘海粟，预见到这样的感情肯定难以持久，也想到了这封信对傅雷母亲和未婚妻所造成的打击，所以在寄信之前先把信拆开看了一下，然后夫妇二人决定不寄出这封信。此时的傅雷，已经无法责备刘海粟私拆并扣压自己的信件这个举动，他有的只是感激与悔恨。

一段看起来惊天动地的爱情就这样结束了，带着一颗满目疮痍的心灵，傅雷离开了巴黎，到了莱芒湖。

在莱芒湖畔，大自然的泥土和芳香使傅雷慢慢地恢复了过来，不久他回到了巴黎，潜心研究语言和艺术；一年多后，又回到了上海。学成回国对于傅雷而言，倒不是一个难以决定的事情。守寡多年、辛苦养育自己成人的母亲，在盼着自己回去照顾；传统的衣锦还乡观念，也使傅雷想早一天回家去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。况且，对表妹的愧疚也使傅雷急于回去补偿。

1931 年，23 岁的傅雷被刘海粟聘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办公室主任（刘是该校校长），并教授美术史和法文。当时的大学教师收入不错，许多海外归国的文化人都选择了教书这一职业。此后，傅雷或者以教书为生或者以翻译为生，终于成为了中国文化界的知名学者。就这样在上海生活了近 20 年后，人生的第二次重大选择，又一次摆在了他面前。

从 1949 年年初开始，谁都看得出来，改朝换代的时刻到了， 对此，傅雷也有十分清醒的认识。 虽然傅雷一向不主动参与政治活动， 并且对政治有一种本能的抵触， 但这并不表明他没有自己的政治观点。实际上，他对国民党的专制与暴虐深恶痛绝。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可以看到，在国民党统治下，中国永远无法实现自己的强国梦想。多少年来，生活在一个自由、民主的国家里，一直是傅雷梦寐以求的事情。但是，即将诞生的新中国，是否就是自己梦中出现的那个国家呢？对此，傅雷没有把握。

其实，傅雷这时的心态，同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心态几乎完全一样。虽然诸多左翼朋友曾向傅雷介绍过共产党，但在没有亲身经历之前，傅雷不愿做出简单的判断。这是他的习惯。傅雷此时又陷入了难以抉择的困境之中。同上一次的抉择类似，让自己做这样的决定确实是非常痛苦的事情。不过最终傅雷还是决定留在国内。

抉择虽然做出了，傅雷却没有上一次的轻松感。上一次可以为了爱情抛弃一切。这一次呢？傅雷可以抛弃什么呢？结婚十几年的妻子，两个可爱的孩子，一个温暖的家庭，傅雷的决定不仅可能会影响自己的后半生，而且有可能会影响一家人的幸福。这样的决定能让人轻松吗 ？

许多年之后，当“ 文化大革命 ”如火如荼地燃遍整个中国，神州大地被一片片红色的海洋所包裹，“ 革命圣火 ”烧到了傅雷家中的时候，傅雷又面临了人生中的第三次重大选择。这时的他已经知道，这是他们夫妇一生中最后的抉择了。他肯定知道，自此之后，他再也不会有什么沉重的感觉了。他将会在天国找到安宁。这对一个一生都充满波折和焦虑的人来说，或许不失为一种上佳选择。

2

1948 年的上海已经是硝烟弥漫。

这时的傅雷已经举家来到了云南的昆明避难，积蓄早已经花得差不多了，老家的田产从抗战起就陆续变卖了大半，为了此次出行，他又把剩下的田产卖了一些，然后把上海的房产抵押出去，这才得以在昆明一家旅馆里面住了七八个月。1949 年 6 月，傅雷一家来到了香港。在香港的几个月里，正是傅雷内心激烈斗争的时候，到底是留在国内还是出国另谋出路，傅雷难以决断。

就在傅雷逗留香港期间，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，向世界宣布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”，“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”。

新中国成立初期，的确是让每个中国人振奋的时代。1949 年 7 月，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召开，来自解放区、国统区的作家、艺术家汇聚一堂，共同迎接创作生命中又一个春天的来临。虽然傅雷还远在香港，但“文代会”的名单中，有傅雷的名字。

此后不久，全国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召开，新中国的中央人民政府诞生了。而在毛泽东宣告新中国成立的天安门城楼上，同他站在一起的，不仅有领导中国人民走向胜利的共产党人，还有 12 个民主党派的代表。这些民主党派的代表，正是在国民党统治的黑暗时期，同专制进行着长期坚决斗争的民主人士。同时，在成立的中央政府各部门中，民主党派人士占有相当大的比重，中央人民政府 6 位副主席中，党外人士 3 人；委员 56 人中，党外人士 27 人；政务院 4 名副总理中，党外人士 2 人；政务委员 15 人中，党外人士 9 人；在政务院所辖 34 个部、委、院、署中，担任正职的党外人士 14 人。

所有这一切，似乎都在向傅雷表明：一个民主、开明的新的人民政权诞生了。远在香港的傅雷对这一切，显然无法默然对待，他心中的热血开始汹涌。或许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，傅雷做出了继续留在祖

国的决定。

一生谨慎，而且对政治有着本能抵触的傅雷，并没有立刻回上海，而是先到了北京。很显然，他这时还心存疑虑。对世界历史有着深入了解的傅雷，从抗战以后就从各种国外的文章中，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了多方面的了解。他知道20世纪30年代苏联清党的血雨腥风，延安那场严酷的肃反运动，也有所耳闻。因此，他要亲眼看一下，新政府的所在地北京到底是个什么样子。而且此时如果直接从香港坐船到上海，路上也不是很安全。

1949年12月，傅雷离开了香港，取道天津来到了北京。在北京期间，他会见了许多老朋友，比如钱钟书夫妇、马叙伦、陈叔通、楼适夷等，进一步了解到了当时社会的境况。不过，这种实地考察看上去没有起到太大的效果。不知道什么原因，热火朝天的北京并没有给傅雷更多的感染，傅雷依然对新政权怀有深深的疑虑。大概是多少年来一直远离政治，从而使傅雷相对于其他人有更多的超然， 更多的旁观者视角。他肯定从这种表面上的热火朝天中看到了什么， 他或许从一个古老的城市走向现代城市的巨变中，感觉到了少许异样。

这次去北京，都是傅雷的好友楼适夷接站、送站。据楼适夷回忆，一路上，他一直在同傅雷争论如何看待新政权的问题。有迹象显示，双方都没有说服对方。傅雷依然坚持自己的怀疑态度，只是他觉得，自己是个中国人，死也要死在自己的国土上。

在北京，著名历史学家吴晗盛情邀请傅雷去清华大学教授法语。此时的吴晗，已经不是在以历史学家的身份向傅雷发出邀请，也不再是独裁时期的民主斗士了。实际上，就在不久前，他刚刚以解放军北平军管会副主任的身份进入了北京，并接管了清华大学，成为该校的校务委员会副主任，不久又荣任北京市副市长。吴晗的邀请表明，共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产党已经向傅雷伸出了热烈欢迎之手，傅雷要做的，不过是伸出自己的手而已。如果吴晗那双手伸向的是其他人，可能大多数人都会感动得热泪盈眶——毕竟建国之初，教授的岗位还是很有吸引力的，何况不少知识分子正处在失业阶段。可是，傅雷没有流露出任何激动，当然也没有显示出任何惶恐。他只是以打太极拳的手法，谢绝了吴晗的邀请。他推诿说自己只想教美术史，不想教法语。吴晗肯定也看出了这是个借口，不然偌大个北京，不会为傅雷找不到一个教美术史的学校。

至于傅雷为什么没有接受吴晗的邀请，原因可能会很多。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很可能是，此时此刻的傅雷对新政权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好感，革命的感召力还没有能够影响到傅雷的内心深处。从傅雷一生的经历可以看出，傅雷真正参加正式工作的时间非常少，教书的时间也非常短。多年来，他主要以翻译为生。在他后来写的“自述”中，有这样的话：

> 一九三一年冬即入上海美专教美术史及法文。……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事变发生，美专停课，哈瓦斯通讯社（法新社前身）成立，由留法同学王子贯介绍充当笔译，半年即离去，当时与黎烈文同事；我离去后，胡愈之、费彝明相继入内工作，我仍回美专任教。一九三三年九月，母亲去世，即辞去美专教务。因（一）年少不学，自认为无资格教书，母亲在日，以我在国外未得学位，再不工作她更伤心；且彼时经济独立，母亲只月贴数十元，不能不自己谋生；（二）× × ×待我个人极好，但待别人刻薄，办学纯是商店作风，我非常不惯，故母亲一死即辞职。①

①《傅雷自述》，见《傅雷文集 ·文学卷》,第 4页，安徽文艺出版社,1998年版。

看得出来，傅雷的教师生涯仅仅止于美专，而且时间非常短暂。就是这两次，傅雷还认为，如果不是为了挣钱赡养母亲，他根本不会去教书。除了教书以及编辑等工作，傅雷很少正式工作过，一生都主要是以稿费为生。

从天性上来看，傅雷好像总是与社会格格不入。教书过程中两次辞职，在“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”任职不久，还是辞职了。辞职的原因，用傅雷的话讲就是：“内政部要我做会计手续报账，我一怒而辞职回家。”在同书斋以外的大千世界进行交往的过程中，傅雷总是难以处理好各种问题。之所以如此，正是因为傅雷天生耿直，眼里容不得半点沙子。在外人眼中，傅雷又丝毫不通人情世故，批评起人来丝毫不留情面，发泄不满的时候更是不吐不快。所有这些，都更加加深了傅雷对公职的厌恶和恐惧。

傅雷的性格使他无法应付社会性的日常工作，除了愤然辞职外，别无他法。其实，就是从这里，显示出了傅雷性格中懦弱的一面。最终，他只能一次又一次地退回到书斋之中。曾有人把傅雷比喻成“孤独的狮子”，其实，傅雷绝不是狮子样的人物，狮子不会只是留在洞中舐食自己的伤痕，更会冲出去，把自己的热血喷洒在敌人身上。傅雷做不到这一点。这是他的宿命，或许也是他悲剧的源头。

还是傅雷的好友杨绛理解他。在杨绛的文章《忆傅雷》中，有这样一段话，非常传神地展示了傅雷性格中真实的一面：

> 有人说傅雷“孤傲如云间鹤”；傅雷却不止一次在钟书和我面前自比为“墙洞里的小老鼠”——是否因为莫罗阿曾把服尔德比作“一头躲在窟中的野兔”呢？傅雷的自比，乍听未免滑稽。梅馥称傅雷为“老傅”；我回家常和钟书讲究：那是“老傅”还是“老虎”，因为据他们的乡音，“傅”和“虎”没

有分别，而我觉得傅雷在家里有点儿老虎似的。他却自比为“小老鼠”！但傅雷这话不是矫情，也不是谦虚。我想他只是道出了自己的真实心情。他对所有的朋友都一片至诚。但众多的朋友里，难免夹杂些不够朋友的人。误会、偏见、忌刻、骄矜，会造成人事上无数矛盾和倾轧。傅雷曾告诉我们：某某“朋友”昨天还在他家吃饭， 今天却在报纸上骂他。这种事不止一遭。傅雷讲起的时候， 虽然眼睛里带些气愤，嘴角上挂着讥诮，总不免感叹人心叵测、世情险恶，觉得自己老实得可怜，孤弱得无以自卫。他满头棱角，动不动会触犯人；又加脾气急躁，制不住要冲撞人。他知道自己不善在世途上圆转周旋，他可以安身的“洞穴”，只有自己的书斋；他也像老鼠那样，只在洞口窥望外面的大世界。他并不像天上的鹤，翘首云外，不屑顾视地下的泥淖。傅雷对国计民生念念不忘，可是他也许遵循《刚第特》的教训吧？只潜身书斋，做他的翻译工作。①

傅雷在自述自己抗战时的情况时，也这样说起过：“抗战期间闭门不出，东不至黄浦江，北不至白渡桥，避免向日本宪兵行礼，亦是鸵鸟办法。”②其实，傅雷并非仅仅抗战期间才是这样。考诸傅雷的生平，我们很容易发现，“鸵鸟的方式”应该是傅雷应对社会问题时的一贯方法。

但这只是傅雷性格的一个方面，如果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的话，可能又会有不同的发现。

建国后，尤其是1957年“反右”以后，傅雷更是把自己长期关在

①杨绛：《忆傅雷》，见《傅雷与他的世界》，第15页，金圣华编，三联书店，1996年版。
②《傅雷自述》，见《傅雷文集·文学卷》第5页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8年版。

书斋中，除了同几个老朋友来往外，主要是同翻译作品中的人物对话，或者给自己亲爱的儿子写信，的确如他自己所形容的，像是生活在洞穴中一样。但是，急风暴雨的政治运动不允许有任何私人空间存在，就是躲在洞中也要把你拉出来在革命的太阳底下暴晒一番，不仅要把你的身体拉出来，还要把你的思想挖出来，做彻底的消毒清理工作。对于傅雷来说，这无疑是最难以忍受的。

当然这是后话了。此时中国的战火还没有完全散尽，傅雷虽然想到了死，但还没有考虑那么多。在一个他还没有真正认清楚的世界里，还是继续躲回墙洞之中，或许更为保险一些。另外，他对于人的存在有一套固定的看法，所以当吴晗作为党的高层领导，向傅雷伸出他的手的时候，傅雷却回绝了。

3

1949 年年底，傅雷重新回到了上海。离开上海有一年时间了，这个城市看起来并没有太大的变化，日常生活还在按部就班地延续着往日的习惯，至少从表面上看还是如此。南京路的霓虹灯照样的灿烂夺目，酒店、咖啡馆里的爵士音乐，依旧能够渗透到外面的大街小巷。只是上一次离开上海逃往昆明时经常出现的警报、警笛声没有了，路人随处可见的惊恐消失了。上海，这个当时东方最具魅力的不夜城，依然在散发着它夺目的光彩。

虽然炮火给这个城市带来的疤痕还在提醒着人们，战争只不过刚刚离开；虽然收音机里传出的声音在告诉人们，一个改天换地的新时代来临了；虽然马路上身穿黄色棉衣的军人会让你有些疑虑：这些山沟里冲出来的乡巴佬儿能否继续延续上海往日的辉煌？但是，几乎所有人都知道，历史已经一去不复返了。但同样的，几乎所有人又都不

知道，未来会是一个什么样子。当然，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，完全可以暂且不管这些，先填饱因战争而饥饿了许久的肚子，才是最重要的。

傅雷也不例外。面对这一切，他的心安定了很多。能够让一家人不再飘零他乡，他为自己做出留下的决定感到了一丝欣慰。往日的生活又回来了，傅雷又重新开始了他的翻译工作。

同其他许多著名知识分子不同，傅雷并没有随着新时代的到来，积极投身于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去。多少年来远离政治的想法并没有改变，傅雷还是选择了认为最适合自己的书斋生活，一直到去世，都没有参加任何正式工作。也就是说，在“单位”成为几乎所有城市人口赖以存在的社会政治皈依的时候，傅雷依然是一个卖文为生的自由职业者，不领取国家的工资。这种情况在今天，也就是在笔者叙述傅雷的今天，已经司空见惯；但在建国之初，据说，整个文化界凭稿费生存的，除了傅雷，另外只有一个人，那就是著名作家巴金。

在北京，傅雷谢绝了吴晗的邀请；回到上海后，他同样谢绝了老朋友们希望他出来工作的建议，还是退回到了书斋。对此，傅雷的老友楼适夷曾这样说起过：

> 傅雷艺术造诣是非常深厚的，对无论古今中外的文学、绘画、音乐等各个领域，都有极为渊博的知识。他青年时代在法国学习的专科是艺术理论，回国以后曾从事美术考古和美术教学的工作，但时间都非常短促，总是与流俗的气氛格格不能相入，无法与人共事，每次都在半途中绝裾而去，不能展其所长。于是最后给自己选择了闭门译述的事业。 ①

作为至交，楼适夷的话确实道出了实情。傅雷给人的印象是，他

①转引自叶永烈：《傅雷与傅聪》，第15—16页，广西人民出版社，2004年版。

好像永远无法从艺术作品的理想世界中解脱出来。当他面对现实社会的时候，更无法用另一种目光去看待。傅雷有其传统知识分子迂腐的一面，甚至到了丝毫不通人情世故的地步，常常让人感到难以容忍，按楼适夷的话说，就是“无法与人共事”。熟悉傅雷的朋友往往都知道这一点，也都能够理解他，谅解他。但别的人就不一定了。和傅雷一起留法的好友刘抗有过这样的回忆：

> 我在沪滨缔婚后，海粟曾设席款待，我们应约赴宴。次周，傅雷亦如法炮制，适内子身染微恙，婉谢之，他认为不给面子，于是雷霆大发，把我送给他的画也除下退回，数月不相闻问。据他自己解释，这种性格应源自老母，盖他是独子，父又早故，慈母变成“严父”，管教苛甚，由此养成突破常规之癖性。①

傅雷脾气的暴躁尽人皆知，几乎所有朋友都能举出各种例子来说明他的性格和脾气。这是一种追求完美的脾气。不过，这种脾气当然也影响了他的一生，尤其是影响了他最后的岁月。这里可以举几个有趣的例子。

从巴黎留学归来，刚到上海时，傅雷经常与刘抗等人打麻将或者打桥牌消遣。这应该是纯粹的娱乐活动，傅雷却非常认真。打麻将，讲究的是看着对家、吃着上家、卡着下家，这都是常用的技巧。打牌的人都是千方百计隐瞒自己的实情，刺探别人的真情。可是，傅雷连打麻将也非常“真诚”，绝不欺瞒别人，以致他的牌别人都能猜得一清二楚。这样当然十有九输。于是傅雷总是大发雷霆。他认为自己老是输，

①刘抗：《傅雷·傅聪》，见《傅雷与他的世界》，第39页，金圣华编，三联书店，1996年版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